

战争是如何演变的 ——一个人道组织的视角：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1863—1960年的历程

丹尼尔·帕尔米耶里* 著
汪中祎** 译

.....

若要探知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以及战争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我们必须首先选择一个恰当的研究机构：它曾经亲历过战事，但又未直接介入战争。这样的机构能够用更加客观和理性的观点来看待战争的发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恰好符合这样的要求。它作为一个人道组织，在过去15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为武装冲突受害者提供援助。它历经无数战争，却始终能以非交战方的身份对战争进行批判性解读。因此，ICRC能够洞悉战争这项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为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的演变——在此期

* 丹尼尔·帕尔米耶里 (Daniel Palmieri) 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历史研究员，撰写过多部有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历史和战争历史的书籍。

** 武汉大学本科，北京语言大学翻译硕士，曾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工作过八年时间，先后担任过翻译及生计项目官员。

间，战争伴随着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以及极端政治意识形态的出现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巨大转变。除此之外，在ICRC成立之初，其成员主要是以某种形式参与过战争的人。该组织于1863年2月创建时，5位创始人中就有3位曾不同程度的亲历过武装冲突。¹这也使得ICRC从一开始就有资格对其亲身经历的事件发表看法。

不幸的是，虽然“战争”一词频繁出现在ICRC的出版物、声明和档案中，但必须承认，多年以来，ICRC只是在理论和一般概念的层面上探讨战争，却未曾提及战争演变的问题。由于ICRC的文献中并没有太多战争学的分析能够阐释战争及其不断变化的性质。因此，我们必须翻阅大量文献，²从零散的文献中总结关于ICRC如何看待战争的主要观点。ICRC关于战争的观点通常建立在战争与和平、军队与平民、文明与野蛮、国内与国际等对立的概念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它对战争的假想解读，这也是本文试图阐释的内容。而且因为该组织当时很少在战地开展工作，因此在它创立之初的50年里，对战争的解读一直都是采用这种假想的方式。这就意味着，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型国际组织的ICRC，其身影基本没有出现在各类军事行动中。此外，ICRC未出现在军事行动中也与它对战争犹疑不决的理解密切相关。本文所涵盖的时间范围止于20世纪60年代，是因为从那时起，ICRC不再沿用其近百年来对战争的假想解读，而试图以另一种方式理解战争。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我们将简要概述ICRC如何应对柏林墙倒塌后出现的战争新形式。

1 亨利·杜南(1828-1910)在目睹索尔费里诺之战(1859年6月24日)中伤兵的悲惨处境后，发起了红十字运动；纪尧姆·亨利·杜福尔将军(1787-1875)是一名瑞士军官、工程师，曾在1847年分离主义联盟战争期间担任瑞士联邦军队总司令；路易·阿皮亚(1818-1898)在包括1859年意大利战争在内的多次武装冲突中担任战地外科医生。

2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刊登在《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公报》(*Bulletin International des Sociétés de Secours aux Militaires Blessés*) (即《红十字会国际公报》(*Bulletin International des Sociétés de la Croix-Rouge (BISCR)*))，后更名为《红十字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上的文章、红十字国际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f the Red Cross*)的报告，以及ICRC的成员，尤其是第二任主席古斯塔夫·穆瓦尼耶(Gustave Moynier, 1826-1910年)在担任ICRC第二任主席(1864-1910年)期间发表的文章。

幻想时代：1863-1914年

战争与和平

ICRC与其他红十字组织都不是反战组织。《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公报》第一期开篇便阐明了这一信条，这也回应了外界对ICRC仅设法减轻战争影响却不根除战争罪恶根源的指责。³ICRC及其所发起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下文简称“运动”）主要致力于使冲突人道化。⁴然而，矛盾的是，战争实际是ICRC赖以存在并“有所作为”的原因，但ICRC却旋即表达了其反对战争的立场——因为战争是苦难的根源。1873年，古斯塔夫·穆瓦尼耶发现，国家红会为一些和平团体（如“和平运动”）的工作提供了间接帮助，这些帮助实际上也产生了有用的辅助效果。⁵的确，ICRC和国家红会的创立旨在对好战行为进行遏制。通过向战争受害者提供有组织的、协调一致的和普遍的援助，团结在白底红十字标志下的救援者怀着雄心壮志，要给战场带去仁爱之心。战争越是人道，战场上的不人道行为就会越少。这必然会导致“人们自然而然地希望看到灾难的源头逐渐干涸”，⁶未来战争终将消失——战争，因其不再是人类暴行的代名词，从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1888年，穆瓦尼耶问道：难道还有人不要把战争视为一种例外吗？⁷民族与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以阿拉巴马号仲裁案为例⁸，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可以有效防止各方诉诸武力。ICRC的奠基者们用他们的成功证明这一想法并非异想天开。值得称颂的是，在ICRC的努力下，《日内瓦公约》得以通过，并成为普遍和永久性的国际条约，从而限制了国家从事战

3 *BISCR*, No. 1, October 1869, p. 3.

4 引自路易·阿皮亚 (Louis Appia) 的原话：“Rapport adressé au Comité international par M. le Docteur Appia sur sa mission auprès de l'Armée alliée dans le Schleswig”, *Secours aux blessés : Communication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faisant suite au compte rendu de la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Genève*, Geneva, 1864, p. 144.

5 “Les dix premières années de la Croix-Rouge”, *BISCR*, No. 6, July 1873, p. 241.

6 *Ibid.*

7 “Les causes du succès de la Croix-Rouge”, *Mémorial des vingt-cinq premières années de la Croix-Rouge*, 1863–1888, Geneva, 1888, p. 13.

8 仿照1872年在日内瓦成立的阿拉巴马号仲裁法庭。

争的绝对权力。作为现代国际人道法的第一个条约，它也为日后其他类似条约的订立铺平了道路，每项条约都是对交战权的进一步限制。但是，很显然，在另一方面，ICRC也目睹了武器的现代化和新型杀伤装置的发展。这一现象使暴力更具威胁性，也更凸显了“真情实感的反战请求”的重要性。⁹矛盾的是，武器的现代化也可能惠及战争受害者。一个例证就是所谓“人道”子弹¹⁰的出现，这种子弹能够在高速穿透人体组织和骨骼的同时不改变形状，因此所造成的不可逆转的伤害更小，最终导致的死亡人数也更少。¹¹但是，要防止这类与战争有关的新技术带来真正致命的伤害，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各国不愿使用这些技术；没有哪个国家想要因第一个使用这种不文明的手段而被其他国家所唾弃。被1899年《海牙公约》所禁止使用的窒息性毒气和达姆弹不正是属于这类情形吗？

ICRC发展的环境可能也是强化和平倾向的另一个因素。毕竟，ICRC是由瑞士公民在瑞士创立的国际组织。自1814-1815年《维也纳和约》和《巴黎和约》签署后，瑞士联邦再也没有卷入任何国际性武装冲突。¹²之后，瑞士也曾出现过几次内部动荡，但即使是1847年分离主义联盟内战那次最严重的动荡，也仅仅持续了一个月，造成不到100人死亡（此次内战总计有约20万人参战）。不仅如此，以纪尧姆-亨利·杜福尔将军（后来成为ICRC的委员）领导的获胜方在战争前后都能以“人道”方式行事。这些事实不禁使ICRC幻想，凭借“运动”所产生的智慧与凝聚力，人类终将逐渐消除战争与暴力。

9 “Les causes du succès de la Croix-Rouge”，同上注7，第16页。

10 《红十字会国际公报》刊登了许多有关改良手枪的文章，当时手枪仍然是战争中使用最为普遍的武器。最早讨论“人道”子弹的例子出现在1885年10月出版的《红十字会国际公报》第64期第151-152页。ICRC成员中最不愿使用“人道子弹”这一术语的人当属费里埃博士（Dr. Ferrière）；例如，见费里埃博士在1908年4月《红十字会国际公报》第154期第89-90页上撰写的《人道子弹》（“Les balles humanitaires”）一文。

11 《红十字会国际公报》刊登的多篇文章都提到军队的医疗报告显示战争中伤员死亡率出现下降，恰好证实了这一点；see, for example, “Quelques rapports sanitaires à propos de la guerre sud-africaine”, *BISCR*, No. 124, October 1900, pp. 269-279.

12 ICRC认为，瑞士是最不可能卷入战争的国家：see “L’avenir de la Croix-Rouge”, *BISCR*, No. 50, April 1882, p. 81.

20世纪初，ICRC与和平的浪漫关系在它获得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时达到顶峰。在一些和平主义者的支持下，为了获得这一奖项，亨利·杜南提出的核心理念是和平与红十字之间的联系。最后，他于1901年获此殊荣。¹³ICRC也想试试运气，却未能成功，在1900到1905年间，ICRC曾先后5次向该奖项发起冲击，但无论是以组织名义申请还是以其主席古斯塔夫·穆瓦尼耶的个人名义申报，均未能如愿。

文明与野蛮

构成ICRC人道项目基础的战争都具备拿破仑式的特征：即国家之间的冲突，参战部队都由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¹⁴并且其中仅有几场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且有可能十分血腥。为了巩固其创始愿景，ICRC的创始者对当时刚结束的，或正在进行的3场战争进行了观察。它们是：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1859年）和美国内战（1861-1865年）。美国内战虽名为内战，但还是能发现其中包含着不同国家之间的争斗。

正是基于对这种战争模式的认识，ICRC才继续发展，并促进了“运动”和国际人道法的形成。尽管这些冲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是善意无害的，尤其就索尔费里诺和马拉科夫之战这样血腥屠戮的事件而言，但他们却都发生在“文明”国家之间。战争无疑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最大罪恶，理应以反对与摒弃，但当两个“文明”程度相当的国家之间发动战争时，战争却又获得了正当性和荣誉。只有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的可怕影响，特别是对受害者的影响。因此，文明本身也使武装暴力文明化。ICRC在创立之初的几十年中，可能是受托马斯·阿奎那“正义战争”理论的影响，对战争的理解较为狭义（还是以正义邪恶为主），认为在找到替代方案之前，战

13 但是，亨利·杜南的候选资格还是受到和平运动中部分人士的质疑。为了缓解这一紧张局面，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同时授予亨利·杜南和法国和平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帕西。

14 对ICRC而言，该因素也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更同情拥有参战国国籍的士兵，而非雇佣军；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可见同上，第68页；“Mémorial des vingt-cinq premières années de la Croix-Rouge”，*BISCR*, No. 76, October 1888, p. 151.

争仍有其存在的必要。而且，当以文明的名义发动战争时，战争似乎又成为保卫文明的一项必要条件。

ICRC曾也是西方全球“开化”运动的支持者，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它本身就诞生于西方。进行“开化”运动的理由很简单：原住民由于其野蛮的行为方式而被视为未通开化的蛮夷，¹⁵需要他人对其进行教化。因此，对殖民探险和征服的需要，在给世界偏远角落带去“进步和启蒙”的同时，去除了原住民凶残好战的习气，并有助于推动战争的人道化进程。而其他一些非欧洲国家则可以在没有外界军事介入的情况下推进战争的人道化进程。在ICRC看来，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¹⁶该国选择接受西方文明，并成为亚洲地区红十字事业的领导者。

ICRC也参与了这个全球“开化”运动，并寻求将尽可能多的国家纳入到该组织的人道使命中。¹⁷每出现一个“非文明”国家（如日本和暹罗¹⁸）接受了红十字原则并使用了红十字标志，就都是ICRC的一次胜利。但是，ICRC的工作在一些国家也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在奥斯曼帝国。该国虽然是最早一批签署《日内瓦公约》的国家¹⁹，但它却并未停止对本国基督教居民的“野蛮暴行”²⁰，而且，奥斯曼帝国还拒绝使用ICRC的红十字标志，而代之以红新月标志。²¹在一些事情上，ICRC也曾有失察之过，如ICRC主席古斯塔夫·穆瓦尼耶曾给予过刚果自由邦极大的支持²²，刚果自由邦是第

15 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非洲人；例如见，“La Croix-Rouge chez les nègres”，*BISCR*, No. 41, January 1880, p. 5.令人吃惊的是，非洲白人也被认为是“未开化”的。比如，来自荷兰的布尔人（他们的祖先在17世纪从荷兰来到南非），就被《红十字会国际公报》称为“半野蛮人”：See “Les insurrections dans l’Afrique austral”，*BISCR*, No. 46, April 1881, p. 53.

16 然而，日本针对被视为文明程度较低的中国实施的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ICRC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see “La guerre sino-japonais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BISCR*, No. 107, July 1896, p. 212 in particular.

17 有关ICRC为鼓励到访瑞士的日本代表团所做的努力，见1873年10月《红十字会国际公报》第17期，第11-16页的文章《日本使团》。日本在1887年批准了《日内瓦公约》，并于同年建立了红十字会。

18 暹罗（今泰国）于1895年批准了《日内瓦公约》，并在同年建立了红十字会。暹罗红十字会在1920年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

19 1865年签署。

20 见《红十字会国际公报》刊登了大量记录土耳其军队暴行的文章，尤其是在1875-1878年大东方危机期间的暴行。

21 这个变化发生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期间。

22 1890年至1904年期间，古斯塔夫·穆瓦尼耶担任刚果驻瑞士总领事。

一个加入《日内瓦公约》(1888年)并建立红十字会(1889年)的非洲国家。但后来证实这是被利奥波德二世控制的傀儡政权,殖民剥削体制在这里引发了20世纪的首批种族灭绝事件。²³尽管ICRC以文明之名义行事,但该组织也曾有过与文明相悖之举。例如,ICRC曾确认,英国军队在恩图曼战役(1898年9月2日)对受伤的伊斯兰教托钵僧的屠杀是有必要的。²⁴20世纪上半叶,ICRC仍奉行文明与野蛮的二元论观点,只不过该观点是以一种更为微妙的形式出现。

国际与国内

ICRC曾计划从解决国际冲突开始,尽管国际冲突只是冰山一角,但也是影响全球稳定最直观、最广为人知的最大威胁。²⁵因此,ICRC提出各国应建立救护伤兵的民间团体,并从1864年起,批准一部旨在承认这些团体地位并为其成员和他们所救助的受害者提供保护的条约。当然,从一开始ICRC就明白是各种形式的国内战争构成了这座冰山在水面以下的部分,但当时ICRC将国内战争人道化的任务留待日后解决。²⁶不过,从第三次卡洛斯战争(1872-1876年)开始,ICRC对内战的关注程度逐渐上升,因为发生在西班牙的这场战争表明,发生在一国内部的武装冲突也能符合ICRC所设想的国际冲突的理想模式(即有组织的武装部队遵守一定的骑士守则并准备好缔结相关的协议,特别是在救助伤兵方面的协议)。²⁷红十字在国内冲突中也能发挥作用的开始产生影响,各国救护协会也介入到此类冲突之中,尤

23 据估计,1888年至1908年间在利奥波德统治下的刚果,殖民剥削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数据来源,见<http://necrometrics.com/20c5m.htm> (所有网络参考资料均于2015年12月访问)。

24 “Les blessés de la bataille d’Omdurman”, *BISCR*, No. 117, January 1899, pp. 40–41. 尽管ICRC一直认为此次事件“情有可原”,但还是给驻苏丹的英国战地记者提供公开反对的机会: see “Les blessés de la bataille d’Omdurman”, *BISCR*, No. 118, April 1899, pp. 109–113.

25 “我们限制自己,仅应对欧洲的重大权力斗争问题”: see Jean-François Pitteloud (ed.), *Procès-verbaux des séanc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17 février 1863–28 août 1914, Geneva, 1999, p. 20.

26 *Ibid.*

27 See “Les blessés espagnols”, *BISCR*, No. 19, April 1874, pp. 145–148; and “Les blessés espagnols”, *BISCR*, No. 20, July 1874, pp. 194–197.

其是在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发生的冲突中²⁸。毋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救援的主要对象是占领国的军队。值得一提的是，当奥斯曼帝国爆发骚乱时，ICRC即表达了对起义方受害者的同情，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与ICRC成员一样都是基督徒。²⁹

军事发展与人道进步

最后，从战争角度讲述ICRC的起源故事，能看出ICRC似乎特别关注技术的进步。ICRC关注利用技术进步推动发展“人道”武器，而更为重要的是改善伤兵的救治，特别是在1914年以前，伤兵是ICRC主要关注的问题。ICRC通过开展竞赛来改进担架设计，从而提升战地医院的设施。同时，ICRC也就上述问题向各国救护协会广泛征求意见，并定期在《救助武装部队伤者协会国际公报》上刊登他们的建议并配图说明。ICRC也提倡在战场使用电力照明设施，以便在夜间寻找伤员³⁰。就战斗员而言，ICRC强调，交通方面的进步，尤其是铁路的使用，已大大改变了战争的面貌，这种进步体现在运输速度和运载能力上，各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部队从欧洲大陆一端运送到另一端。1892年第五届红十字国际大会（简称“国际大会”）明确讨论了未来战争会出现不断通过创新寻求更为残忍的杀戮方式的问题，并向各国国家红会提出这一问题，而且还呼吁ICRC征集各方意见，并于下次大会汇报³¹。于是，在1897年第六届国际大会上，ICRC提出了19条措施，旨在呼吁各国国家红会做好应对传统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这比做好准备应对新科技在武装冲突中的应用更为重要。³²这并不奇怪，因为“运动”忽略了一些关键性的技术进步，例如，没有预料到民用科技应用于军事的后果。1911年，

28 “我们希望，在国内武装冲突中，交战各方能够采纳人道原则，这也是我们工作遵循的一个原则。交战各方至少应认同这样一个共同理念：伤者应得到尊重和照顾。”：“Les dix premières années de la Croix-Rouge”，*BISCR*, No. 16, July 1873, p. 235.

29 See, for example, the articles “L’insurrection macédonienne”, *BISCR*, No. 136, October 1903, pp. 205–206; and “Le Comité de Constantinople et les massacres arméniens”, *BISCR*, No. 159, July 1909, pp. 191–192.

30 第三届国际红十字国际大会第M号决议，1884年，日内瓦。这次会议也表示希望使用无菌服成为所有一线军队以及各国国家红会遵守的医疗服务规范。

31 第五届国际大会，罗马，1892年。

32 第六届国际大会，维也纳，1897年。

虽然有报道称在意土战争期间意大利空军发动轰炸（空袭也击中了一些受保护的地点），然而，ICRC并未注意到这是首次使用飞机投掷炸弹，也没有注意到战争将从此扩展到空中领域。

幻想破灭：1914-1918年

ICRC对战争演变的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双重转变。ICRC为战争受害者（主要是战俘）开展的工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ICRC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开展实际工作的组织，以ICRC国际战俘局为典型代表，在战争最激烈时，国际战俘局共有120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援助工作，除此之外，该局还拥有充足的物资和经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ICRC还直接派代表对交战国战俘营进行探视，因此这一次ICRC与战争有了直接的联系，战俘问题也成为一个个切实的研究课题。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ICRC日内瓦总部与一线代表处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反映出直接参与战地工作的人和没有亲临战场而只能通过他人对战争的描述来了解战争的人在如何看待武装冲突这一问题上的区别。

直接接触战争使ICRC能够对局势的演变，尤其是对新作战方法的使用进行近距离的观察。水下作战、使用鱼雷对船只实施攻击（包括医院船）、针对战俘的报复行为和使用毒气都是ICRC主要关注的问题。“一战”期间，ICRC向交战各方提出多项抗议，并呼吁交战各方限制或禁止新型武器的使用。³³然而，这些努力往往徒劳无功，或者只是在战后才得到响应，禁止使用毒气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³⁴

交战各方对其倡议的冷淡态度使ICRC认识到一个新的现实：虽然战争仍主要由“文明”国家发起，但从中再也看不到骑士精神，战争已经超越了国际法对其施加的一切限制，变得像“野蛮人”之间的战斗一样惨无人道。

33 这些呼吁和抗议首次发表在《红十字会国际公报》，在一战尾声，这些内容又被集结成册：*Act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pendant la guerre 1914-1918*, Geneva, 1918.

34 1925年《战争中禁用窒息性气体、毒气体或其它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通过表明ICRC在这一问题上的努力取得了成果。

ICRC意识到本应规制武装冲突的法律存在低效与不足的问题。这促使ICRC在一战结束之前便开始考虑起草一份能够适应全新战争形式的战俘待遇规则。³⁵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的通过标志着该项工作初见成效。

ICRC对战争看法的另一个重大改变则与战争受害者有关。同盟国军队对比利时、塞尔维亚和法国北部的入侵，对平民的驱逐，对被占领国居民的劫持，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发生的针对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迦勒底人的大屠杀，使ICRC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战凸显出平民曾是，也一直都是武装冲突的受害者。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巴尔干战争期间前奥斯曼帝国欧洲版图内民众被迫背井离乡的惨景就是明证。这一认识促使ICRC将其部分人道工作转向平民受害者，在国际战俘局内专门设立了一个为平民提供援助的部门。在一线工作中，一旦有机会并在获得交战方批准后，ICRC代表也会对因具有敌国国籍而被拘留的平民进行探视。³⁶另外，ICRC还公开谴责对平民实施的残忍行为，包括1915年发生在亚美尼亚针对平民的大屠杀³⁷。但是，平民受害者这一新的关注点真正开始产生影响，还得归功于ICRC在一战后所开展的工作。

一战之后：1920-1930年

ICRC负有介入国际武装冲突的法定职责，但国内武装冲突则不在其职责范围之内。但在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ICRC曾正式宣布放弃对国际性与国内武装冲突的区分。一战结束后，ICRC被请求协助进行俄国和前同盟国战俘的遣返工作，为此，ICRC在这些战俘的过境国或原籍国设立了首批常驻代表处。当时，ICRC正在东欧地区开展工作，正值柏林、

35 Daniel Palmieri (ed.), *Les procès-verbaux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s prisonniers de guerre, 21 août 1914–11 novembre 1918*, ICRC, Geneva, 2014, p. 235, available in French at: www.icrc.org/fre/resources/documents/publication/p4220.htm.

3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探视报告发表在Documents publiés à l'occasion de la Guerre, 24 series, Geneva, ICRC, March 1915–January 1920.

37 “一个由亚美尼亚人组成的委员会呼吁我们关注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而且土耳其人毫不掩饰自己进行种族灭绝的目的”：《红十字会国际公报》，1915年10月，第184期，第438页。

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华沙正经历严重的政治动荡以及由此引发的骚乱、革命和战争。ICRC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尤为具有代表性的是，1919年3月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随后发生在8月的“白色”反革命事件中能看到ICRC驻匈牙利代表的影子。面对人们的苦难和提供人道救助的机会，ICRC代表开始介入一国内部的危机，这原本不在该组织的职责范围之内。通过这种方式，ICRC驻匈牙利代表无意间为ICRC今后介入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铺平了道路；同时，他还将ICRC的工作对象扩展到其他受害者（如本例中，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白色”反革命事件中的政治犯³⁸），并拉开了一些新工作（向平民直接分发援助和医疗用品）的序幕。

因此，ICRC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工作都主要针对非战斗员，因为战时所作出的一些决定对他们的影响依然存在（例如，对德国及其盟国的经济封锁导致这些国家出现粮食短缺³⁹）。欧洲版图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间冲突仍给他们带来直接后果。发生在匈牙利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其他国家的内部动乱（如西里西亚和爱尔兰）最终使ICRC得以具有在内战中开展工作的正式身份，结束了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的两分法。但令人惊讶的是，人道行动的这一新领域却仍然为战争法所忽视，修改各项条约的一切努力仍只关注国际性武装冲突；1929年《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ICRC看法的另一个重大转变是其意识到人类想有朝一日消除战争或许只是痴人说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便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各国，尤其是一战战胜国对和平的希望终成泡影。通过设在东欧的代表处，ICRC很快发现战争的硝烟并没有随着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议的签订而消散。波兰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匈牙利和邻国、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爆发的新的国际性武装冲突延续着1914-1918年间的杀戮。无论是1921年召开的国际

38 “La protection des étrangers à Budapest”, *BISCR*, No. 202, 15 June 1919, p. 705. 受害者的另一种新类型是难民，尤其是来自俄国的难民：“Appel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en faveur des réfugiées russes nécessiteux”, *BISCR*, No. 220, 15 December 1920.

39 Maurice Gehri, “La vie chère en Autric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No. 22, 15 October 1920.

大会提出的“打击游荡在世界上空的好战幽灵”⁴⁰，还是各国在1934年东京国际大会上表达的更强烈的阻止战争发生的想法⁴¹，听上去都只是不可能实现的希望。

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战后，战争法都没有得到各国应有的尊重，《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都是如此，实现世界和平的希望也因此受到重创。ICRC于1921年提出的建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对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进行审判的计划也胎死腹中⁴²。正因为如此，ICRC才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巩固现行国际人道法上。第一步就是对在一战中受到严重伤害的受害者提供专门保护，包括战俘和军事占领区的居民。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专门性公约的通过，表明ICRC战俘保护相关工作初见成效。但是，对于ICRC提出的包含33项条款的旨在向拥有敌国国籍的平民提供保护的条约草案，虽然得到1934年第十五届国际大会⁴³的支持，但却因一些国家的沉默而止步不前。同时，第十二届国际大会还授权ICRC推动保护平民免受空投化学战剂危害的工作。⁴⁴1928年至1931年期间，ICRC召集了3个国际专家委员会，并成立了一个有关空投化学战的资料中心，收集与该问题有关的所有信息，供各国国家红会和公众查阅。但是，1938年初ICRC终因财力不济而不得不停止这项工作。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武装冲突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专制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切暴力之源。西班牙内战、中日战争和意大利对外战争等例子都表明，战争不再只以打败敌人目标，而是要彻底消灭敌人。然而，ICRC似乎并未意识到，或者忽视了冲突各方政权本身的极权性质，而是继续按照一贯的国家间的战争或内战的二元体系对这些“新的”冲突进行分类。另一

40 第十届国际大会第5号决议，1921年，日内瓦。

41 第十五届国际大会第24号决议，1934年，东京。

42 第六届国际大会第4号决议1897年，维也纳。早在50年前，ICRC就已经提议建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对有关行为进行审判，但该提议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see “Note sur la création d’une institution judiciaire internationale propre à prévenir et à réprimer les infractions à la Convention de Genève, par M. Gustave Moynier”, *BISCR*, No. 11, April 1872, pp. 122–131.

43 第十五届国际大会第39号决议，1934年，东京。

44 第十二届国际大会第5号决议，1925年，日内瓦。

方面，在一线工作的ICRC代表已经注意到这些冲突的特殊性，尽管他们并未对这些冲突进行分类。因此，当意大利军队在埃塞俄比亚对受保护的红十字场所进行轰炸并使用芥子气进行攻击时，当西班牙内战中的战俘被民族主义者和人民战线的军队处决时，ICRC一线代表便向ICRC日内瓦总部传达了他们对这些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以及不断出现的此类冲突的担忧。但是，这些控诉并没有得到ICRC总部的真正重视。

幡然醒悟：1939-1945年

ICRC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ICRC在二战期间所面临的问题与一战中遇到的问题并无二致，只是这一次人道需求和人道工作的规模之大是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法企及的。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看，形势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让ICRC感到欣慰的是，该组织在禁止使用战争毒剂方面的努力已见成效，战争期间，交战各国并未大规模使用毒气；但是，另一方面，从德国入侵波兰开始，ICRC和红十字运动为保护平民免遭空袭所付出的努力⁴⁵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940年3月，ICRC发出了一项长期呼吁，反对将飞机作为一种作战方法⁴⁶，但该项呼吁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自1929年起，战俘就开始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当国际法与集权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在战俘待遇问题上又出现了不确定性。无论是苏联给予战俘的待遇问题，日本在其占领国境内给予战俘的待遇问题，还是德国给予苏联战俘的待遇问题，尽管ICRC做出了努力，但在这些情形中国际人道法和人道行动仍显得无能为力。

但是，被占领土平民的遭遇确实暴露出ICRC对战争看法的局限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ICRC曾建议交战各方通过1934年东京公约草案，以使其在敌对行动持续期间能够适用。只有德国表示愿意就该问题进行

45 特别见关于保护平民免受空袭所作出的呼吁，第16届国际大会第9号决议：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伦敦，1938年6月：报告，日内瓦，1938年，第103页。

46 “Appel concernant la protection de la population civile contre les bombardements aériens”，*BISCR*, No. 452, April 1940, pp. 321–327.

讨论，条件是其他国家必须给予德国相同的待遇，但实际上德国并没有这样做。缺乏对平民的保护给纳粹德国境内被驱逐的平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整个二战期间，ICRC曾竭尽全力对此进行干预，并按照其为战俘提供救助的方法，尝试以各种方式向这些受害者提供帮助：比如收集被驱逐者信息，帮助其与家人通信，向集中营提供食品和医疗用品，并试图对集中营进行探视。但是，纳粹德国当局拒绝了其中大多数的请求。尽管不能因ICRC没有为被驱逐的人提供帮助而横加指责，但必须强调的是，ICRC依旧没有打破将平民与武装冲突的“传统”受害者（即士兵）作为一体来看待的思维定式。ICRC未能认识到这些被驱逐者，尤其是因“种族”被驱逐的人与士兵的巨大区别，并对时间这个关键性因素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被驱逐的平民被关在监狱中直到死亡，他们不像战俘那样还有等到重获自由的希望。在这方面，传统上的那种按部就班的人道努力对这些生命进入倒计时的平民受害者而言是徒劳的。与其他国际组织一样，ICRC也无法摆脱常规做法的窠臼，在明显不同的情势中，ICRC仍希望沿用这些传统的做法。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ICRC并未留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新作战技术，然而1945年8月对日本的两次原子弹攻击将该问题重新摆上台面。原子弹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引发的恐惧又重新唤醒了“运动”中已沉寂多年的和平主义思潮。和平主义思潮重新出现，促成战后的第一次国际大会通过了两项有关决议⁴⁷，并成为“运动”在冷战时期的主要关注点。

理性时代：1945-1960年

支撑ICRC对战争假想解读的最后一个二元对立概念是文明与野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ICRC对此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当时，“野蛮”一词往往被用来形容各殖民地的人民。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大多数殖民冲突强化

47 Resolution XXIV (“Non-directed Weapons”) earnestly requested States to undertake to prohibit absolutely all recourse to atomic weapons in the event of war; Resolution LXIV (“The Red Cross and Peace”) reaffirmed the Red Cross’s determination to work for enduring peace among nations. See *Seventeenth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Conference, Stockholm, August 1948: Report*, Stockholm, 1952, pp. 94 and 102–103 respectively.

了ICRC对于文明与野蛮之战的想象。毫无疑问，1935-1936年发生在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动摇了这一观念，因为一个文明国家可能比“野蛮人”更残忍。种族灭绝集中营的建立是对此观念的最后一击——建立建立集中营的国家也曾是文明的发源地。从那时起，ICRC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开始更加关注那些处于文明阴影之下的人。1945年以后爆发的殖民地独立战争使荷兰、法国、英国、比利时和葡萄牙这些殖民帝国逐步解体，这也加速了ICRC态度的转变。从法律上讲，殖民地独立战争可以被归为内战或内部动乱。在这些武装冲突中，ICRC的援助对象主要为被殖民者，包括战斗员和平民。交战双方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伤亡最惨重的是原住民。这使得ICRC因为国家的原因而面临困境，成为ICRC履行人道使命的重大障碍。在阿尔及利亚冲突期间，ICRC很快就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允许，对被俘的敌方战斗员和平民进行探视，但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期间，ICRC很难从英国政府那里获得同样的许可，只是在起义接近尾声时才开展了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开展一线工作时，ICRC代表曾注意到，即使殖民当局的行为是合法的，也不能排除他们对因反叛而被捕的殖民地人民实施虐待的可能性。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人实施的酷刑折磨就是最好的佐证。当然，原住民一方在殖民地独立战争中是也犯下了一些罪行，但自此“文明”的白人和其他“野蛮人”这样的区分就从ICRC的话语中消失了，尽管在少数报告或信件中仍存在一些带有种族主义的表述。1945年以后，无论战争发生在何处，ICRC仅以向战斗员和战争受害者提供最大限度保护的方式介入战争。

结论：全新战争观？

因此，ICRC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将其对武装冲突的认识与现实结合起来，最终理解并适应战争演变的方式。事实上，该组织在创立之初的50年里并没有在战场上开展过一线工作，这也是ICRC对战争的理解相对滞后的原因。那时ICRC对武装冲突的认识是由该组织成员的想象而形成的，而这些成员都是来自处于长期和平状态下的国家并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ICRC也

曾屈从于西方和基督教的世界观，这影响了它对武装冲突性质的判断，而这一点在殖民地的武装冲突问题上尤为突出。这一种特殊的思维模式是该组织创建以及最初现代国际人道法发展的出发点。⁴⁸用ICRC创始人之一路易·阿皮亚的话说，建立ICRC是旨在“使战争人道化”而非参加战争，但ICRC还是受到19世纪末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也许更多地是受ICRC的雄心壮志驱使，而非其信念使然。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理想愿景也随之破灭。ICRC意识到，战争非但远未实现人道化，反而由于技术的进步（如坦克、潜艇、飞机、毒气等的出现）而变得更加不人道。受ICRC委派去帮助战争受害者（战俘和被拘禁的平民）的代表们更是证实了这一令人遗憾的现实。在ICRC的总部所在地日内瓦，数千名法国平民从被占领土逃到这里，ICRC亲眼见证了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对于这些可怕的事态发展，ICRC确实做出了回应，谴责这些针对平民以及在敌对行动中实施的违法行为，但有时ICRC的回应在上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似乎首先需要向自己证明这些情况是真实存在的。毒气问题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毒气早在1915年就开始投入战场，但是直到1918年ICRC才对在战场上使用毒气的行为进行公开谴责。在试图唤起人类的良知无果后，ICRC转而寻找法律上的解决方案，尽管法律的手段也非尽善尽美，但必须承认的是，法律确实是人类文明最后的捍卫者。交战方提出的许多旨在构建“人道”战争框架的倡议都得到了ICRC的支持，ICRC自己也开始考虑对现行法律进行修订，但也只是通过被动的方式，仅借鉴过去的经验，而并未尝试预测战争未来的发展走向。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ICRC的工作重心从对武装冲突理论研究逐渐转向在武装冲突地区开展工作。此后40年左右的时间里，ICRC是在冲突不断的环境中不断发展的。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局势又再次恶化，出现了新的暴力形式：从种族冲突、民族冲突以及非结构化冲突到“反恐战争”，最后再到尚不构成武装冲

48 ICRC的创始者们错误地认为互惠原则构成了1864年《日内瓦公约》的范围的基础，我们可以去探究ICRC对战争的片面理解是否就源于这一错误认识。

突的其他暴力局势（如阿拉伯之春）。ICRC在其中许多局势中开展工作。若要分析自1990年代以来，ICRC对武装冲突的认识是否及如何发生了改变似乎还为时尚早。然而，鉴于发生在一些地方，尤其是西非和高加索地区的内战情势，ICRC也许会重拾一个与“野蛮”类似的概念，而且在该组织本身也成为武装冲突直接受害者时更是如此。迄今为止公认的平时与战时之间的区分显然也因为“反恐战争”而变得模糊。即便如此，与其创立之初不同的是，ICRC亲历了这些新的暴力形式。ICRC也因此接触到了新的武装冲突受害者，认识到了新的需求，而最为重要的是，这迫使ICRC彻底反思其对战争的理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ICRC一直奉行这种“知行合一”的方式，这无疑也是该组织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人道组织，ICRC通过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来适应其所处的工作环境。如今，在自动控制和机器人学方面的重大技术挑战让ICRC再次面临战争演变的转折点，同时，这些挑战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未来的作战形式。虽然ICRC可以努力禁止将这些技术运用于武装冲突之中，或退而求其次，通过法律限制这些技术产生的致命影响，但却很难预测一旦这些技术手段用于军事用途可能带来的人道需求。战争的一个恒久不变的特征是：人们只能在战争爆发后才能认识到它产生的影响，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地谈论战争演变的问题。